



# 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

## 唐弢传略

伏 琥



四十多年前，唐弢教授在他第三本杂文集《投影集》的序中，曾自惭生活在人生的战场上，却并不曾肩过枪，只拿着一支小小的笔。他写道：“有人以为笔就是枪。我想，这家伙是在替我掩盖着短处了，报之以无声的苦笑吧”。

的确，笔，可以说是他生活、战斗、工作的唯一武器；不过，这当然不是他的“短处”。在整整半个世纪的岁月里，他就是利用一支“小小的笔”为我国社会科学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，使他由一个只有初中二年级学历的农民孩子，成为我国现代著名的作家、文艺评论家、现代文学史和鲁迅研究的专家。

### 一、“赤足者”的攀登

一九一三年三月三日，唐弢出生于浙江省镇海县古唐村一个务农家庭。原名唐端毅，常用的笔名有风子、晦庵、若思等。家有田三十亩，再租进了一些，共有五十几亩。祖父和他

的三个儿子同心协力，辛勤耕耘，大小十口之家的温饱尚能维持。后来，祖父和未婚的叔父相继病亡，伯父与父亲分了家，情形随之大变。伯父不再劳动，染上了赌博、抽大烟的恶习。不久将分得的田卖尽。不到两年，祖父遗下的三十亩田，有三分之二，都转到了别人的名下。后几年，家境日艰，伯父卖尽当绝，远走厦门，在码头堆栈当了一名搬运工，再未回过家。

父亲没有读过书，家庭的挫折，使他企图另找生活出路。他穿上长衫，和土地分了手，加入了地主开设的一家米店，字号“同义”，兼做碾米生意。“同义”的掌柜、会计，都是地主的心腹。父亲没有能力过问店务，却常到店里去支钱，年终结账，亏了一笔很大的款子，无奈，只得卖掉田地，但还负了不少债。这次失败，使父亲陷入了深深的苦恼。加上两三年中，他一直在主持铺路、修桥、疏浚河道、举办学校；他又有一手祖传的针灸技术，不分昼夜为人义务治病，有时深更半夜，也要打着灯笼，跑到很远地方去行针。内忧外伤，风雨操劳，终于使他在悲愤痛苦中病倒了。由于母亲的精心照护，他拖了三年，一九三二年冬天的一个中午，在一种疯癫状态中去世，年龄还不足五十岁。

母亲是一家糖行秤手的女儿，也是文盲，从小就跟外祖母辛勤纺纱，补贴家用。来到唐家以后她备受生活的艰辛。父亲死后不久，她就瞎了右眼。眼看这个家不行了，父亲生前的债主便加紧逼债；亲友也冷淡下来，村上更有人向这个“无主”之家作威作福。世态炎凉，给唐弢留下了深刻而痛苦的印象。

这个家，和一个僻处海滨、居民种田捉鱼的小村镇，就是唐弢童年生活的环境。他从小就表现出对于知识的渴求，稍稍懂事的时候，就常跟大人们走三里多路，到一个小茶馆去听新闻。茶馆里只有七八张方桌，一些粗笨的条凳，却是农民们消闲、过精神生活的地方。在茶馆里说新闻的是金昌瞎子，各乡发生的事情，不出十天，就可以从他口中详详细细从头听到

尾，有说，有唱，有插科，给人以欢笑、感叹和悲伤。这个金昌，给唐弢留下很深的印象。后来，他阔别十年再回故乡，还专程去茶馆访问他，不料他已于五、六年前被时间悄悄地带到另一个世界去了。这使唐弢感到失望、悲怆。一九三五年五月，唐弢在《消闲》一文中写道：“有趣的插科都给金昌带走了，这里剩下的，也是一出没有欢笑的穿插的悲剧。”

一九一九年稍后，他在故乡上小学，读的是旧书。古籍中，他最喜欢诗、词二道，曾熟读乐府、古诗十九首等。他特别爱陶渊明、李白、李商隐等人的诗，不仅读，而且写。开始，他说这“大概终不出于是想玩玩”；但有一段时间，却起劲地写起旧诗来，那原因，听说是同一位先生赌气。据那位先生的意见，搨锄头柄人家是决不会生出书香子弟来的。他还引了《三国演义》中刘备所说的虎父无犬子的话做“逆定理”。唐弢决心用自己的行动向这种传统偏见挑战。可惜的是，他的旧诗大多散失了。后来，为了给“过去的生命”一点纪念，他在《从此盖棺定论》一文中抄录了二十首，有写企旅感慨的，有抒以身许国之情的，有酬友的，还有表露隐逸思想的。虽然他自认为这些诗作是不成材的东西，但却是他不凡的志气和努力攀登文化阶梯的成果。

一九二六年，他小学的一位同学要去上海读书。这位同学的父亲是上海“三阳”南货店的经理，因他离家后田地由唐弢的父亲帮助管理，两家算有点关系。唐弢便与他的儿子一同到了上海，并一同进了英租界的华童公学。校长和大部份教师都是英国人。唐弢去时本是高小二年级下学期，但被校方压低一年，仍读二年级，不过因为他中文好，后来又回升了一级。在这里学习的费用，均靠亲友资助，住宿就在“三阳”南货店上面的三层阁楼里，同学徒、店员在一起。住处的窗口正朝着南京路，“五卅”运动一周年时，他还从窗口看到了南京路上群众游行的情景。

读到初中二年级，经济外援终于不济，他被迫辍学，其时是一九二九年，他十六周岁。恰好，上海邮局（原大英书信馆）正式招考，为生活所迫，他便按照招工规定，将年龄虚报为十八岁前往投考，居然考取了。于是他去邮局当了邮务佐，即拣信生，比听差、苦力稍高一点，也属邮政工人。这前后，他又换过三回住处，迁出没有扶梯的楼阁，搬进不见天日的灶披（厨房改住人），基本上仍是同店员、学徒同住。

邮局工作是三班制，他充分利用了倒休时间，带上干粮，去图书馆如饥似渴地广泛地阅读了古今中外的大量著作，进行刻苦自学。就这样，他完全突破了短促的学历给他带来的知识局限；开始阅读“新月派”诗人的诗，他特别喜欢闻一多、徐志摩的诗，又读鲁迅的散文和小说，使他从此放弃古文，改用白话。

唐弢积极参加中共地下党所领导的工人运动，主要是做文字工作，油印传单、编小册子等。自己学到的一些文化知识，竟在这有关社会变革的活动中派上了用场，他感到由衷的兴奋。但他当时似乎还没有意识到，他那双生下来就踩着海滨农村原野上的泥土的脚，这时已经一步一步地踏进文化界了。

自然，这经历了一个艰苦的过程。他在《锲而不捨》一文中曾对这一过程作了形象的描述。他说：“人家‘生龙活虎’，而我却跨着慢步，一颠一簸的走。不过获益的也在此。因为一颠一簸终是在走着，也许旁观者会嫌我慢，也许自己会不满于这天生的迟钝，鞭策之来常如可期。我不敢休息，不敢停留，朝朝暮暮，向着远道拖动沉重的步伐。人家三天五天可以走完的，我要走上一个月两个月，人家一个月两个月可以走完的，我也许要走上三年五年。这自然很可笑，但可笑里还掺杂着四个大字，而这四个大字却代表着向上的一面：‘锲而不捨’。”

## 二、文化战线的新战士

一九三二年，唐弢组织了有邮局工人、学徒、店员等参加

的“读书会”，先是读文艺书籍，后来政治、经济方面的书籍也读；还请人作报告。一九三三年，他们想请从苏联回来的林克多讲苏联工人的生活。因鲁迅先生为林克多的《苏联见闻录》作过序，他们便通过鲁迅去找他。从此，唐弢开始了同鲁迅的通信：他得到了一位伟大作家的指引，成了鲁迅和其他现代文学先驱者的血肉哺育的“一大群新战士”中的一员。

一九三三年，他那枝“小小的笔”引起了世人的注视。当时，他的家庭连遭不幸，使他深感忧愤和寂寞。屋外是兼旬的细雨，胸中是沉郁的块垒，他多想一吐为快呀！但是，孤身客寄他乡，哪里有恳谈的对象？于是，看报，看《大公报》，看《申报·自由谈》；同时，他拿起笔，把萦迴在脑际的关于往事的回忆写了下来，投给《自由谈》，登出来了！这便是他的第一篇问世之作《故乡的雨》。接着，他又写了也是关于故乡的《海》、《怀乡病》等。

对故乡的怀念，是他创作中经常出现的内容。他说：“我的故乡很平凡，实在没有别人可以注意的所在。它是普通的农村，但故乡是和童年紧接在一起的，怀念故乡，实际是怀念童年。”又说：“我现在珍视我的童年，因为在我的童年里有天真和快乐，而且我知道，我的天真和快乐是由二颗忧伤慈惠的苦心所织成的。”（《推背集·南归杂记》）这里所说的“二颗忧伤慈惠的苦心”，乃是指他的母亲和祖母。因此，他笔下的故乡，总笼罩着一层散文诗意和童话色彩；不过，泥土的清香里又往往掺和着缕缕哀愁。对这种复杂的故土之情，他曾引用东汉王粲《登楼赋》里的话：“人情同于怀土，孰穷达而异心！”加以说明。他认为，“离乱之后，会更执着地爱念故土，许多无名英雄，默默地战斗，暗暗地死去，正是从这一点出发，积聚心志，以完成壮丽的任务的。人们之不胜其低徊与向往也在于此。”（《短长书·溃羽杂记》）原来，在他委委抒情的篇章里，正含蓄着战士的热烈的情怀！

他向《自由谈》投稿的时期，正是鲁迅大力提倡杂文的年代。就在这被人们称为“杂文年”的风气之下，他很快由写散文转向了杂文；除了《自由谈》，他还通过《火炬》、《太白》、《人间世》、《新语林》、《读书生活》、《动向》、《语林》等处，向当时的政界、文坛射出了一排排的子弹。

一九三五年五月，他将此前写的杂文八十几篇汇集成书，取名《推背集》。相传唐代李淳风与袁天纲作《推背图》，到第六十回时，袁推李背而止之，以此名集，即表示以后不再写作这样的文章了。但是，这时他已名声在外，索稿的人很多，而且指定要杂文，竟成欲罢不能之势。

这本书付印的时候，正值《新生周刊》刊登《闲话皇帝》一文得罪了日本天皇，引起日本国的交涉，国民党政府上下遑遑。书的原稿被“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”久扣不发，一年之后领回来一看，凡是提及皇帝的内容，不管是中国皇帝、外国皇帝，或是死掉的皇帝、活着的皇帝，统统划上红杠删掉了。

书一出版，北平《北平新报》、天津《益世报》、上海《卫报》、《立报》等报纸纷纷发表专题评论文章。《立报》一九三六年六月八日刊登《读〈推背集〉》一文说：“这个集子就是充分发挥了投枪的作用的。他毫不隐饰地揭穿了一些英雄的脸谱，指给大家看却原来是那么的丑恶……他（指唐弢）是永远站在正义这一方面的，而态度又是那么潇洒，只轻轻用笔尖一扫，就使他的反对者张皇失措，从而至于销声匿迹。”

《铁报》一九三六年六月十日发表《唐弢及其〈推背集〉》的评论文章，副标题叫“一位泼刺的杂文家”。当时评论文章的作者中，包括现在著名评论家罗荪。

一九三六年五月，他又将新写的四十七篇杂文集结起来，取名《海天集》。他在《前记》中写道：“年轻的时候，因为乡居近海，每当苦闷，常常跑到海滨去，我神往于这辽远、阔大的海水。自从投荒到都市以后，我就只能看看天，但幸而也

还是辽远、阔大的。我从海和天得到了不少安慰。这几年来，我又在文字里去找寻安慰，但我还是企望着海，企望着天，企望着辽远阔大的生活。”

第三年，抗日战争爆发，因家庭原因，唐弢没有离开上海。他同曾一度在党内领导上海文化工作的王任叔建立了联系，积极进行敌后文化战线的抗日救亡活动。他继续在《文汇报·世纪风》、《导报·晨钟》、《循环日报·海风》、《译报·燧火》、《宇宙风》乙刊等报刊上发表杂文，向外国侵略者，向敌伪汉奸展开斗争。他还编辑《文艺界》丛刊。为了生活，他同时在几所中学兼课，因此，他常常在邮局上长夜班，以便让出白天的时间去教书。他在学校里，同青年学生一起参加抗日爱国运动。

一九三八年他积极支持新发刊的《鲁迅风》的活动。

一九三九年，他家里发生了一系列新的变故。四月，亲殁了一个三岁的孩子；十月二十二日深夜，他二十七岁的妻子死于肺结核；十一月三日晚，另一个五岁的孩子被结核脑膜炎夺去了生命；月底，年迈的祖母受不住哀伤的折磨，悲痛而逝。在艰苦中挣扎着的家，转眼间只剩下两个人：他自己和一个六岁的孩子。几个月的丧葬救护，累得他精疲力竭，瘫了下来，以至于麻木、模糊，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。

不过，他并没有被悲痛压倒。这几年中，他那支笔仍然取得了可观的成果。一九三九年，出了文艺评谈集《文章修养》；一九四〇年出了杂文集《投影集》，书名含义既说明是“时代的投影”，又是对亡妻、亡子的悼念，同年还出了另一本杂文集《短长书》。“短长书”是《战国策》的别名，因集中文字均写于抗战中，故借用了这个名字。一九四一年《劳薪辑》出版。这个书名，作者在《题记》里作过解释。他说：这些文章“都是我悲愤惨苦，奔走衣食时的偶尔的执笔，有几篇还写于病的呻吟中。但我自信关怀到自己的地方并不多，这个集子就

是有力的证据。而上海的‘新进批评家’却给我加上了‘记住自己’的罪名。”重读之后，“记起动笔时的境遇，哀愁结集心头，名之曰‘劳薪’”。

一九四一年，太平洋战争后，日本侵略者接管了邮局，一切制度仍旧，局长是法国人；后来，日本人逐渐增多。一九四三年初，汪精卫伪政权在南京成立，并接管了邮局，唐弢便离开那里，到一家私人办的小银行去当秘书。那时他投稿极为谨慎，许多刊物背景不清楚，都不能投。当商业性的由平襟亚创办。由柯灵编辑的《万象》出现之后，他才同留沪的进步文化人一道为之写稿。

一九四五年初，柯灵第一次被捕，原因是他工作的《文汇报》出了巴人、唐弢等六人写的一本《边鼓集》，柯灵通过探监的妻子转告唐弢，说日本人也要抓他。他便化名王晦庵，托他的一位学生（地下党员）找关系去解放区，当他在一所地下党员当校长的中学等待交通时，日本投降，他便决定不走了。柯灵也从杭州返回上海，他们共同编了《周报》。又与马叙伦、周建人、郑振铎、傅雷等发起组织民主促进会，投入了反饥饿、反内战、反独裁的运动。

一九四七年年末，他新的杂文集《识小录》出版。他在《序》中写道：“清初，徐树丕以明朝遗民，曾有识小录之作，又自号活埋庵主人。我生于民国，无须远攀古人，俗话说：‘不贤识小’，袭用旧名，正是对自己的一种鞭策，也以抗议三十年来，身所经历的活埋式的环境。”

一九四八年，还出版了一本散文集《落帆集》，收进散文二十八篇，其中三十年代的六篇，另二十几篇均为四十年代所作。唐弢自己很喜欢这本书，的确，其中如《寻梦人》、《桥》、《路》、《窗》、《城》等等，文笔优美清新，感情浓郁，十分感染人。有的篇什情绪有些忧郁、苦闷。在他的朋友当中，有人认为那几年他的杂文似乎也有点散文的倾向，而且以为这

是生活折磨的结果。他自己认为：“试一回顾，仿佛也真有这样的事实。但是，这可又是‘记住自己’的证据了……但不是故意作伪，我想，文章总是沾着作者的血肉，蘸着作者的思想的吧。”他还认为：一个人似乎总有战斗与沉思两个方面。鲁迅的《野草》就是在战斗中的沉思。

是呀，一张一弛，文武之道，一个战士也需要有“弛”的时候。

### 三、学习鲁迅，研究鲁迅

唐弢杂文的社会影响增大，却给鲁迅带来了一点“麻烦”，有的人说他“模仿鲁迅”，有的人认定唐弢就是鲁迅的化名，如潘公展办的《社会新闻》，就把他的《略论英雄》、《老话》等文章当作鲁迅写的，大肆攻讦。为了不让鲁迅蒙不白之冤，他使用了一个比较固定的笔名：风子，并注上了地址，但仍有人说，这也是鲁迅！

一九三四年一月六日，他同鲁迅才第一次正式见面；这之前，虽已在内山书店和版画展览会上见过鲁迅，但他那时是一个不满二十岁的拣信生，没有胆量去接近一位声震文坛的巨匠。这一天，《自由谈》主编黎烈文请撰稿人聚会，到会十二人，计有：鲁迅、郁达夫、王映霞（郁达夫夫人）、林语堂、郭林凤（林语堂夫人）、胡风、阿英、陈子展、曹聚仁、徐懋庸、唐弢、黎烈文。他怀着内疚不安的心情去会见鲁迅，他以为鲁迅先生会生气，或者责备他太冒失，但在互通姓名以后，先生却只是风趣地对他说：“唐先生做文章，我替你挨骂！”

接着又亲切地问：“你真个姓唐吗？”

“真个姓唐。”

“哦，哦，我也姓过一回唐的。”说完，笑了起来。鲁迅这里说的，是指他曾用过“唐俟”这一笔名。

鲁迅进而鼓励他多写杂文，还说：“不需要解释的事，就

不解释。不如为读者多写点文章。”

至于替他挨骂的问题，先生安慰他说：“那不相干！他们总是要骂的，骂鲁迅是‘公事’，不骂就会失业。让他们骂吧！骂得好，我看。我看他们骂人的艺术。”

眼见新的杂文作者成长起来，鲁迅感到无限欣慰。他兴奋地说：“人家‘围剿’杂文，我们也来大干一场！”

那些“看文章专用嗅觉”的人的攻击，自然是出于他们的政治需要；不过，唐弢学习鲁迅却是事实。他一进入文化界，就坚定地站到鲁迅的旗帜下。尽管他们来往的时间不算长，鲁迅对他的帮助却是多方面的，具体的，影响更是巨大而具有根本性的。

他写信向鲁迅请教学问之道。

鲁迅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七日抱病复信说：“日文的学习书，过几天可以往内山书店去问来，再通知……单靠日本文，是不够的，倘要研究苏俄文学，总要懂俄文才好。但是，我想，你还是划出三四年工夫来（并且不要间断），先学日文，其间也带学一点俄文，因为，一者，我们先就没有一本较好的华俄字典，查生字，只好用日本书；二者他们有专门研究俄文的杂志，可供参考。”

在这封信里，鲁迅先生还建议他“进夜校之类”去进修。

过了十来天，八月九日鲁迅又写信给他说：“内山书店的关于日文书籍的目录，今寄上。上用箭头的是书店老板所推举的；我以为可缓买或且不买的，就上面不加圈子……学校我说不出好的来，但我想，放弃发音，却很不好。不如就近找一个学校（不管好坏）或个人，学字母正音及拼法，学完之后，才自修。无论怎样骗钱的学校，教拼音之类，也拖不到两个月的。”

鲁迅在其他多次手书和谈话中，还对他出书、编刊、读书及知人论世等方面给予很多极为宝贵的指导，如劝他不当职

业作家，搞业余创作，基本上生活有保证；提醒他不要满足于写短小的文章；在文坛比较复杂的情况下，可以暂不参加某些文学组织，免得陷入人事纠纷。对鲁迅先生的教导，他总是认真听取、实行的，这从他的创作、研究活动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。当时和以后许多有见识的研究者们都指出了这一点。

如《短长书》出版后，香港《大公报》就认为唐弢很有希望成为鲁迅先生而后的一个杂文大手笔，并提出许多篇目互相对比。评论写道：“《文苑闲话》是继鲁迅遗业的、一篇清扫文坛魑魅的精作，尤其使一些趁着巨人倒下来的时候，跳跟起来的‘文豪’们，撕破了面孔。”又说：唐弢的杂文与鲁迅的很神似，这位巨匠的遗产给他以丰富的滋养。《关于翻译》、《谈集体创作》，正是《三闲集》里的笔墨；《文苑闲话》恰可作《题未定草》的续篇；《看报》和《做戏》，放在《准风月谈》里可乱真。抓住事物的矛盾结节，无情地插进匕首；揭开蒙蔽的黑幕，活现黑幕后的真形，这种战斗精神，唐与鲁是共通的。他们杂文的讽刺性是在言笑中戳破奸人的假面，叫他们自己打嘴巴，自画脸谱。《文苑闲话》与《题未定草》可谓功力匹敌，不但在行文技巧上见功夫，更发现了作者深邃的学力和识力。他们杂文的暴露性，同样以小见大，从微显著，由现象深掘到本质。这种迂迴曲折，是搏击前的从容不迫，好整以待，突然一击，易制对手以死命……行文的风趣，形象的简练，比喻的机敏，旧事的融合，旧词的活用，鲁之所能，唐都已升堂入室。接着，评论也谈了唐不如鲁的地方，最后总括说：“同一颗爱人类、恨黑暗的心，换来的反抗战斗情绪却有温静、激荡的差异。”

他自己的说明，首先是通过鲁迅的指引，他才认识了自己作战的阵地和进击的方向。他在《纪念鲁迅先生》一文中说：许多年来，看惯了卑污、欺诈、威胁、残杀，知道自己是生活在怎样丑恶的社会里，却不知道何时才会好起来，好象就有些

“虚无”；虽然相信愉快的日子终会到来，至于是谁能使人生愉快，却一向没有想到。直到读了鲁迅的文章，通信，以至面晤以后，才渐渐地克服了虚无思想，找到了问题的答案，不再一味做梦了。这以后，我的匕首和投枪就有了目标。

他的散文，也深受鲁迅影响。他自己说，他的散文大致可以分为两类，一类就象鲁迅的《野草》那样；另一类则象鲁迅的《朝华夕拾》那样。

同时，他觉得自己不能同鲁迅相比，自己“虽心仪斗士，时涉遗著，但凡所作和鲁迅的杂文相比，真如谿壑之于大海，部娄之于泰山”。但他又认为，鲁迅创造的新杂文深厚博大，拟同准范，但倘说天下杂文，必依鲁迅风为归，则是近于排他的主张。向先行者学习，又始终“记住自己”，不可亦步亦趋，刻意模仿。所以他总是深入理解鲁迅做人、为文的立场、观点、方法，思考鲁迅文章言行内蕴的精髓，将鲁迅的“血”和“奶”变成自己的“肌骨”。这样，他在向鲁迅学习，跟随鲁迅战斗的同时，实际上也就在研究鲁迅，发扬光大鲁迅精神了。

唐弢把一九三六年称为“这可诅咒的一年”。这年十月十九日，鲁迅先生在上海大陆新村九号寓所内与世长辞。他怀着巨大的悲痛，参加一系列悼念活动，写了很多悼念文章。他写道：鲁迅的血是“为着孩子，为着弱者，为着正义和公道而流尽了，即使是最后一滴，也都喂哺了我们。”“从此以后，爱先生的人，将会更爱先生之所爱，而更恶先生之所恶的吧。后死者的肩上，重起来了。”

他参加了一九三八年版《鲁迅全集》的部分校对工作。事后他回忆当时的工作情形说：“六七个人聚在小小的亭子楼里，忽而鸦雀无声，忽而唾沫四溅，工作一会，又争论一阵，就这末过了两个月，总算把六百万字校完了，大家松口气，点点头道：‘完工了！’”他在《关于〈鲁迅全集〉的校对》一文中认为：这是后死者可做的“使辉煌的功业活在斗士的心里，

永不磨灭”的事情。

由于时间匆促，人手有限，这一版本的《鲁迅全集》难免多有遗漏，于是唐弢又担起了补遗的任务。一九四六年十月，他辑录的十五万字的《鲁迅全集补遗》终于出版。在《编后记》中，他对一些重要佚文作了详细的考证、说明。他还写道：“以先生之浩瀚博大，后生小子，亦何足以知其万一。我之所以敢于肩起这份辑佚的工作，率先登场，无非是跑龙套打头阵，多少含有一点期待的意思。然而先生的文章是切实的，决不因我的肤浅而减色，即使残文断句，有如日月丽天，使人眼明心暖，加强了斗争的勇气。”

《补遗》出版之后，唐弢继续搜集鲁迅的遗文遗稿，到一九五一年底，又辑到三十五万字之多，便编成了《鲁迅全集补遗续篇》一书。为了这个集子，他把所有可以休息的时间，都花在翻杂志、查有关文字、跑图书馆、访旧书铺上面，并且大都是在每天深夜进行考订编辑的工作。

这两本书，是最早、也是最多的关于鲁迅著作的补遗，为研究鲁迅提供了重要资料，也引起了人们对辑佚工作的重视，日本学者曾作过专门介绍。

在搜集、整理鲁迅遗产的同时，他还写了大量研究鲁迅的文章。这些文章，涉及的方面很多，有论述鲁迅所走的道路的，有研究鲁迅某方面的思想、成就的，有评论具体作品的，还有论述鲁迅对政治、文艺、社会问题的观点主张的等等。它们先后收入《鲁迅杂文的艺术特征》、《鲁迅在文学战线上》、《向鲁迅学习》、《海山论集》等论文集中。

一九五六年九月发表的《鲁迅杂文的艺术特征》一文，是唐弢在研究鲁迅方面取得的一个突破性的成果，从纵的方面，从总体归纳上论述鲁迅杂文的艺术特征，他当时是第一人。

《论鲁迅的美学思想》一文，是他研究鲁迅的另一项突出成就。鲁迅并无专门的美学著作，但在他的著作中，却处处表现

了他的美学思想和精辟见解。唐弢的功劳，就在于他较早提出了鲁迅的美学思想这一命题，同时从其浩瀚的作品中深入发掘，把分散的论述，予以系统、广泛的论列。

他认为，鲁迅留给我们的遗产是极其丰富而珍贵的，值得我们世代的人认真研究，从中发掘出为今天服务的东西来。他说，象政治与文艺的关系，现实主义，批判与继承等直到现在还常常争论的问题，在鲁迅著作中就解决得很好。他还指出，鲁迅的文艺论文，非常形象生动，引人入胜，没有一点架子。现在有些文艺论文，从理论到理论，空洞难懂，应该认真研究、学习鲁迅的经验。

在唐弢心目中，鲁迅如“大海”。如“泰山”，但他研究鲁迅，却一贯坚持着实事求是的严格科学态度，在努力阐明鲁迅的伟大的同时，也注意到他的某些不足，他并没有离开鲁迅所处的时代及各种具体条件去研究鲁迅。

#### 四、为建设新中国的文化事业而奋斗

新中国一建立，唐弢立即以巨大的热情，投入了新中国文化事业的建设。

解放初，上海市召开第一届邮政工会会议他被选为执委会的五位常委之一，并兼文教科长；一九四九年六月底到北京参加第一届文代会后，被选为全国文协委员和上海分会常委，《文汇报》副刊部主任。同年七月中旬，他应邀去复旦大学讲课，兼上海戏剧专科学校教授。一九五〇年，他参加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的筹备工作，并任文物处副处长。这期间，他写了大量歌颂新时代，赞美新生活的文章，一九五一年接连出了短评集《可爱的时代》《上海新语》。

他在前书的《后记》里写下了他写作时十分感人的心情：“爱，这个字是很足以说明我落笔时的心情的。每天，面对着从新闻里涌现出来的新人新事——这些足以代表毛泽东时代英

勇的人物和可歌可泣的故事，我的心是虔诚而激动的，歌颂是一种自然的流露，我觉得这正是我的爱，虽然这里也收集着打击敌人，批评落后的篇什，毫无疑问，这些篇什，也还是我对同志、对时代的爱的反射……我的任务就是要表现这一点——特别是我留居的上海，从旧到新，从落后到进步，从帝国主义者的殖民地到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生产城市。我以感奋的心情来描绘它，我写出它的转变。”

后来，文协上海分会改为华东文联，他任编辑出版部主任。一九五五年，上海市文联成立，他出任作协上海分会书记处书记；一九五六年任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长。

唐弢，是解放后继续写杂文的少数作家之一，一九五五年出版了新的杂文集《学习与战斗》，一九五八年出版《繁絃集》，对生活中一些不良现象提出了批评，表现了一位正直的战士的本色；遗憾的是，到了一九五七年，他却因几篇杂文挨了整；之后，他去农村、工厂劳动了一年；一九五九年调到北京，在中国科学院（现中国社会科学院）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，直到现在；现在他还任中国作协理事；曾当选为第二、三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，第四、五届全国人大代表。

## 五、全国解放以来的主要著述研究活动

解放以来，他的重要文学活动是文学评论和现代文学史研究，这方面的成果主要表现在解放后新出的著作中，如《创作漫谈》、《晦庵书话》等。前者的基础，是一九五八年辅导工人创作的讲稿，本来上海已经排好，他还写了序文《告别上海》。但姚文元说，这本书光讲技巧，不谈政治思想，出它干什么。上海便毁了版。那时姚文元虽未进政治局，但已受到当时上海市委负责人的青睐。他十分生气，一到北京，就由作家出版社重排出版。你不准出，我偏要出；不过时间已是一九六二年下半年了！

他主张，评论文章也应写得自然、流畅，有艺术性，有艺术趣味，还要有个人风格、特点、见解，同人家不一样；因此他不大同意一人写一部份的集体写作的搞法，说这是受了苏联的影响。

近几年来，他还主编、出版了《中国现代文学史》一至三册。他主张，研究文学史，一定要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，坚持历史持平主义。他说：“过去有些没有写的作家应该写，写得不够的应该多写，评价错误的应该纠正。要把问题放到一定历史范围内去分析，注意它的发展，实事求是地分析。”关于研究方法，他觉得“不用科学的比较方法不行”。他还说：引进外国的东西，必须结合这个国家的民族特点、欣赏习惯、美学兴趣等等，慢慢的和原来的传统融合，一部份被抛弃了，一部份被吸收了，然后新的民族风格才能建立起来。

他主编的“文学史”，大体上具有这些优点，因此，当一九八一年十二月，《中国文学》作了介绍之后，海外许多人都写信给他，表示赞赏。

唐弢教授现在已是六十九岁的人了，但仍然精神抖擞地工作着。他带研究生，他出外讲学，他参加国内许多社会科学方面的活动，他还打算亲自动手写一部《鲁迅传》；虽然这部著作现在尚未出来，但它的副产品《鲁迅的故事》却早已为国内外所熟悉了；而亲自重编一部《中国现代文学史》则是他另一个强烈的心愿。

1982, 11, 22

## 附：唐弢著作要目

- 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-----------|
| 推背集               | 1936年 | 上海天马书店    |
| 海天集               | 1936年 | 上海新钟书店    |
| 文章修养              | 1939年 | 上海文化生活书店  |
| 投影集               | 1940年 | 上海文化生活书店  |
| 短长书               | 1946年 | 上海北社      |
| 劳薪辑               | 1941年 | 福建改进出版社   |
| 鲁迅全集补遗            | 1946年 | 上海出版公司    |
| 识小录               | 1947年 | 上海出版公司    |
| 短长书（增订改版本）        | 1948年 | 上海南国出版社   |
| 落帆集               | 1948年 | 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 |
| 可爱的时代             | 1951年 | 上海平时出版社   |
| 上海新语              | 1951年 | 上海《文汇报》   |
| 鲁迅全集补遗续编          | 1952年 | 上海出版公司    |
| 向鲁迅学习             | 1954年 | 上海平明出版社   |
| 学习与战斗             | 1955年 | 上海文艺出版社   |
| 唐弢杂文选             | 1955年 | 人民文学出版社   |
| 向鲁迅学习             | 1956年 | 上海新文艺出版社  |
| 鲁迅在文学战线上          | 1957年 | 中国青年出版社   |
| 鲁迅杂文的艺术特征         | 1957年 | 上海新文艺出版社  |
| 鲁迅先生的故事           | 1957年 | 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 |
| 繁絃集               | 1958年 | 作家出版社     |
| 莫斯科抒情及其它          | 1958年 | 作家出版社     |
| 书话                | 1962年 | 北京人民出版社   |
| 创作漫谈              | 1962年 | 作家出版社     |
| 燕雏集               | 1962年 | 作家出版社     |
| 海山论集              | 1979年 | 人民文学出版社   |
| 鲁迅——文化新军的旗手       | 1979年 | 湖南人民出版社   |
| 中国现代文学史（一、二、三册主编） | 1979年 | 人民文学出版社   |
| 回忆·书简·散记          | 1980年 | 三联书店      |
| 唐弢近作              | 1981年 | 四川人民出版社   |